

认知翻译学与识解机制

王寅

(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认知翻译学是一门将“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与“翻译学”紧密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 充分体现出现代哲学中的体验人本精神。本文拟将认知翻译学描写为“如何在译入语中识解原作者在原作品中的原意图”, 且运用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用以解释语言表达主观性的“识解机制(包括5个要素: 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 从认知角度来简析翻译中的常见方法, 以期能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具体的新思路。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认知翻译学; 翻译过程; 识解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891 (2013) 01-0052-06

1. 引言

西班牙翻译家Martin (2010: 169) 虽提出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这一学科, 但她认为当前该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 极不成熟, 属于“前范式(Pre-paradigm)”阶段。也就是说, 将“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CL)”与“翻译学”有机地整合起来, 形成一门较为完善的、并被普遍接受的研究大脑黑匣子中翻译过程的学科, 还有漫长而又艰辛的路要走。但人们早已认识到了翻译中的认知转向, 1995年就召开了这方面的专题研讨会, 1997年由Danks等编辑出版了*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口笔译认知过程》), 标志着翻译学进入了新时期, 2010由Shreve & Angleone编辑的*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翻译与认知》)更是将该学科沿此方向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既然尚不成熟, 就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加以完善, 既然道路漫长而又艰辛, 更值得我们去努力攻关。笔者在2005年、2008年和2012年论述的基础上, 再次运用CL(包括认知语法)中的“识解(construe, construal)”来专门论述翻译过程问题, 尝试为认知翻译学充实新内容。

2. 认知过程与翻译过程

CL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 认为语言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笔者(2006)还进一步解析了核心原则中的“认知”所涉及到的具体环节。

体验哲学和CL认为, 人们的认知过程起始于互动性感知体验(如感知环境、移动身体、发出动力、感受力量等), 逐步形成了意象图式(Image Schema), 在此基础上结合隐喻模型、换喻模

作者简介: 王寅,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翻译学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3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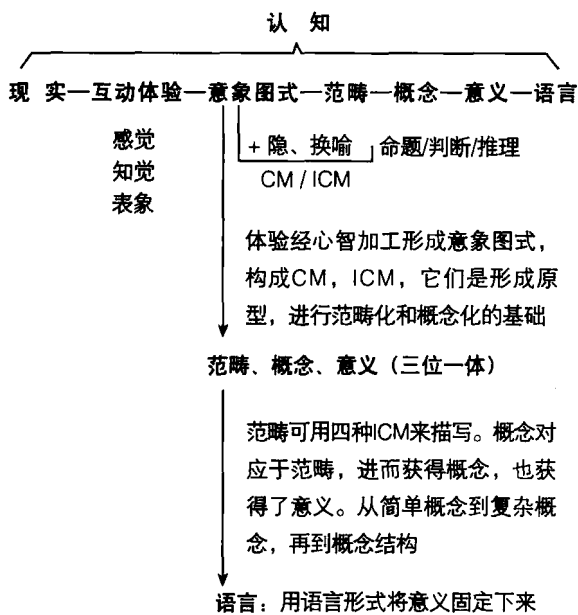


图1

型、命题模型, 建构出抽象的认知模型 (Cognitive Model, 简称CM), 若干个相关CM整合起来进而形成了“理想化认知模型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简称ICM)”, 基于此自然就可形成一个范畴原型, 进而可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 同时形成意义。将范畴、概念和意义用语言形式固定下来就形成了各类构式 (包括词、词组、句子等)。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很多基本概念, 又逐步将其组合和整合成复杂概念, 进而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复杂概念结构。

若以此核心原则来解释文学作品, 这就是我国一贯倡导的“文学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说其来源于生活, 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互动体验; 若说其“高于生活”, 则突显了人主体的提炼加工。该核心原则也可用来解释翻译过程, 可将两套“现实—认知—语言”平行排列, 结合图1以对比不同民族语言的形成机制, 建构出如下英译汉翻译活动的模型 (参见王寅 201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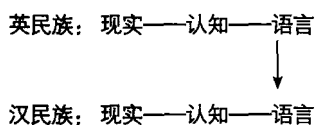


图2

要研究翻译过程, 就必须关注译出语和译入语形成的“互动体验+认知加工”的机制, 因此CL的成果特别适用于研究翻译过程。

近年来部分后现代哲学家提出了“激进人本观”, 过分张扬人本精神, 著名口号“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是这种观点的写照。该思想反映在翻译理论中就是过分倚重读者或译者主体性的作用, 企图颠覆“信达雅”, 甚至喊出了“翻译就是再创作”、“爱怎么翻译就怎么翻译”

等口号, 而认知翻译学基于体验哲学和CL核心原则对其做出了深刻反思, 认为从不考虑人本因素的文本主义角度研究和理解翻译问题是不妥的, 这就是马克思 (1844) 所说的“人化的自然”, 据此语言必当也是“人化的语言”, 这里包括两个要素“人化”和“语言”, 它们当需兼而有之, 不可偏废。不能走极端, 完全抛弃“人化因素”不妥, 但完全抛弃“文本基准”, 用“创造”取代“翻译”, 也是过分之举。

王宁 (2011) 曾指出, 译者必须臣服于文本, 其地位不可被夸大。生态翻译学 (胡庚申, 2008) 认为, 译者必须尊重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 它的作用必须受到现有文本的限制。译者如何臣服于文本, 文本如何限制译者? 可用笔者 (2009) 提出的“SOS”模型做出合理解释。当两个主体 (S) 面对相同客体 (O) 时, 从图2可见, 现实决定认知和语言, 全世界各民族必定能享有若干普遍观点, 这就是全人类得以相互理解和翻译的基础。又由于两边的S必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 因此各民族的认知和语言必然要嵌入各自的主观因素, 烙上各自的文化特色。

为批判激进人本观, 笔者 (2009, 2012b) 根据SOS模型提出了“体验人本观”和“体验认知观”, 它们同样适用于认知翻译学。“体验”指互动感知, 更具客观因素; “人本”或“认知”指人主体加工, 更具主观因素。两者的结合更具理论解释力。这也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 一方面要坚持“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立场,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译者与作者及文本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 这与 Martin (2010: 177) 所说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模仿”完全相符。也相当于王宁 (2011) 所说的“再现性改写”、“创造性再现”、“相对创造性”、“超越字面的‘信’”、“创造性忠实”, 追求“人本主义”与“文本主义”之间的平衡, 当取“解构兼建构”的思路, 既有写真, 也有创造。

我们尝试以“三原”来解释“臣服”的具体标准, 即译文应能尽量反映“原作者”在“原作品”中所陈述的“原意图”。要能实现这一点, 我们基于2005年和2008年所论述的翻译认知观, 进一步将认知翻译学的基本原理细述为“体验着原作者的体验, 认知着原作品的意义, 解读着原写作的意图”。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既尊重原文本, 以“直译和异化”为依据; 又考虑到译者的主观性, 兼顾“意译和归化”方法。主客主相结合, 这就是我们所论述的“SOS”之关键, 基于体验人本观来解构“文本中心论”, 并颠覆“译者中心论”, 两者兼顾才能相得益彰, 这正是认知翻译学的基本出发点。

3. 识解研究与翻译过程

大多学者对“翻译基本要求是忠实原文”没有多大异议，但问题在于“何为忠实”，“如何界定忠实的程度性”，我们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个大概，在原作者、原作品、原意图的控制范围内做有限调变。按要求，口译（特别是同声传译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要尽量忠实于原文，保持“中立性”，但很多口译者都有切身体会，认为这实际上做不到，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译员的立场和看法。任文（2011）曾对其做过调查，有62.2%的人认为做不到。这就是说，他们必然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做出调变。张其帆（2011）也对同传中的删减和增译做出了论述。

笔译和口译都要涉及到“调变”，至于如何调变，做什么样的调变，我们认为可借用“识解”为其做出统一的解释。

Langacker（1987，1991）在认知语法（为CL一个核心分支学科）框架中提出了人类认知的一种主要方式“识解”，且将其定义为“人们具有用不同方式来理解同一场景的能力”，主要包括5项要素：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突显（salience）。他主要用此来解释人们为何在面对相同场景时会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述。我们认为，这一机制不仅可用于分析语言层面的表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解释人类主观性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方案，而且还适用于研究翻译的认知过程。笔者曾运用该认知方式分析了40篇《枫桥夜泊》英译本之间的差异，我们认为，它也可被视为认知翻译学中一项基本内容，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3.1 详略度

翻译技巧中所述及的“词量改变（包括增添、删减、重复）”，就与“详略度”密切相关。所谓“详”，是指对译文做更为细化的处理，包括添加词语、各类注释（如随文加注、脚注、译者注等）；所谓“略”，指对较为复杂的原文做简化处理，包括省略部分词语。如杨宪益在翻译鲁迅《祝福》时，对文中描写祥林嫂的语句“头上扎着白头绳”译作“had a white mourning band round her hair”，译文中增加了“mourning”一词，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汉民族用扎白头绳表示戴孝”的风俗习惯。

翻译课和教材上对这类翻译技巧都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3.2 辖域与背景

语言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历史之中，翻译也必定要涉及到这些背景知识，文化翻译派十分强调这一点。现笔者从隐喻角度解释如下。

隐喻（可概述为A is B.），即以一个概念域

（始源域B）来喻说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A），学界常用“两者间存在映射关系”来解释为何能用B来“喻说”A。但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为何能“喻说”？我们认为，这背后必定要涉及到“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等因素。例如英民族之所以说as bitter as wormwood（明喻也可视为一种隐喻），是因为英国长有此类很苦的蒿类植物，才有此明喻，而中国似乎无此类植物（即使有，也不常见），因此就没有此类说法。

又如英国与荷兰在历史上曾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多次战争，两国为此结下仇恨，为此英民族创造了许多由Dutch构成的侮辱荷兰人的贬义性习语，如：

Dutch courage 意为“酒后之勇”；Dutch uncle意为“严厉的训斥者”；beat the Dutch 意为“令人吃惊”；in Dutch 意为“处于困境中，失宠”；get one's Dutch up 意为“发火”；Dutch treat意为“各自付费的聚餐或娱乐活动”；go Dutch 意为“各自付款，AA制”。（参见刘新桂王国富，1994：272）

可见，将英语这类习语译为汉语时，其中的“Dutch”一词当省去，将原先的隐喻表达（用具体的荷兰人B来喻比抽象的不良行为A）直接还原为A，因为汉民族没有此类文化习惯和历史背景，未形成“荷兰人B”与“这些不良行为A”之间的映射关系，因此就没有此类对应的表达，这些习语也就不能采用“直译法”，而将其还原为原始的抽象概念A，这里又经历了一次“隐喻映射”过程。这就是笔者（2012a）所说的，英汉两民族在表述和翻译这类习语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隐喻过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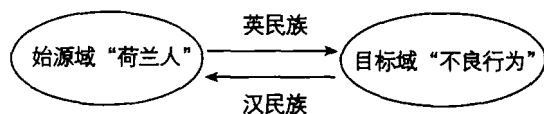


图3 英汉翻译过程中的两次隐喻过程

英民族基于英荷战争这一历史事实和文化辖域，通过认知加工创造了若干侮辱荷兰人的习语，在将其译成汉语时必须考虑到汉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和“现实基础”，若缺乏类似情况，若将其按照字面意义硬译，则会使汉民族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除非采用上述第1点，或Baker所说的“明细化”策略，添加必要的背景信息，如加脚注，或以译者按的形式做出解释，否则这一翻译活动就是无效之举。图2将两套CL核心原则对应处理，更利于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现实、文化因素、历史背景”对于隐喻的形成和翻译所涉及的认知机制，也说明CL的概念隐喻机制对于认知翻译学的指导意义。

将汉语中某些成语译为英语时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会涉及到两次隐喻转换的现象，如：

金枝玉叶：quite a lady

残花败柳：grown-up people

3.3 视角

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它们长在各人的身上，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看世界都有各自的视角，常以自身为参照点来观察世界和他人，因此，人们常以自身为视角来择用代词（如this、that、these、those）、确定时态（常以讲话人时间为基准）、组织语句（可从作者的视角和立场发表意见）等，这亦可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著名诗句加以阐释。有人明明吃了败仗，却偏说“对手太狡猾”；“常败将军”可被美化成“屡败屡战”，成了不屈不挠的斗士。

“视角转换”在翻译中也是常有之事，如常见的翻译技巧“词类转换、成分转换、句型转换、人称转换、肯定句译为否定句、否定句译为肯定句、主动态译为被动态、被动态译为主动态”等等都是基于这一认知机制的。例如：

No wheels missing. 英语否定句可译为汉语的肯定句“轮子都在。”

Water and air have little effect on lead. 英语的肯定句译为汉语的否定句“水和空气对铅没有什么影响。”

“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之间的转换，也是一种“视角（或参照点）”的转换，即以实际讲话人的视角，还是以作者或叙述人的视角为参照点的问题，例如：

“你的妹妹有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

“Aren't your sisters going to school?”

She answered in the negative, giving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at she would be counted upon to be their teachers after her graduation. “But,” she went on, “I don't know whether I could make good; if not, I'm afraid I'd be a great disappointment to my sisters.” (转引自彭发胜, 2011) 英译这段对话时，将答话人的“直接引语”部分改为“间接引语”，且为了使得译文通顺，且还增加了如下信息，如giving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he went on, I'm afraid等。

同样一句汉语“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因所参照的时间视点不同而有了两种不同的译文：

戴乃迭：Dedicated to those who working selflessly to invigorate the Chinese nation.[H1]

葛浩文：Dedicated to all those who work for the future of China,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中文中“为……工作”在戴译中处理为“正在”；而在葛译中处理为“将来”，两位译者所参照的时间范畴不同。

上述几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译界常讨论的“归化vs异化”、“意译vs直译”、“表征过分vs表征不足”、“常规化vs舶来品”等问题，实际上就是基于哪个视角或参照哪个基准点进行翻译的问题，是站在“顺应本族”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引入外族文化”的立场（参见王寅, 2012a），Halverson (2010: 352) 曾提出“引力假设”来解释这类现象，即译者被吸引到本族文化和语言，还是被吸引到外族文化和语言，也属这类问题。现笔者列表对比如下：

		顺应本族A	引入外族B
1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	归化	异化
2	从语句意义的视角	意译	直译
3	从母语表现的视角	表征过分	表征不足
4	从借用词语的视角	常规化	舶来品

图4

在翻译时究竟以A栏为视角，还是以B栏为视角的问题。同样一个原文，若采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译法，如上文第2点所举的带Dutch的习语。又例“crocodile tears”可采用归化法译为“假慈悲”；也可采用异化法译为“鳄鱼的眼泪”。英语明喻as bitter as wormwood，若采用归化法可译为“非常苦”，若采用异化法可译为“苦若艾蒿”。

又如文学作品、电影等以人名或地名作为标题时的翻译，也是归化译法大显身手的地方：

Rebecca 译为 《蝴蝶梦》
Waterloo Bridge 译为 《魂断蓝桥》
Madison Bridge 译为 《廊桥遗梦》

下面是欧·亨利三个短篇小说名的两种译法（摘自张经浩, 2011）：

	按字面直译 (异化)	按内容意译 (归化)
Cabbage and King	《白菜与国王》	《东扯西拉》
Waifs and Strays	《流浪汉》	《东零西散》或 《事不随人愿》
Witch's Loaves	《巫婆的面包》	《多情女的面包》

图5

亦有学者主张，可将汉民族的特色表达输出给外乡异族，既可以让异国同胞感受到新鲜感，也可取得文化互通的效果，如“脸红得像鸡冠”就可直译

为“sb.'s face is as red as a cockscomb”。“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韦利和林语堂分别将其直译为“Ruling a large kingdom is indeed like cooking small fish.”“Rule a big country as you would fry small fish.”（摘自杨柳 衡浏梓，2011）

另外，翻译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直译+意译”，或曰“异化兼归化”，例如：

（1）直译兼意译。该法可有效弥补单独使用一种方法造成的缺憾，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异国风情，也能使读者明白其义，不至于影响正常阅读。如将汉语的“五行”译为英语时，可先采用音译法译为“Wuxing”，再在其后用括号加注的方法解释为“（five elements）”。

再例，汉语中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被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汉英译时将中国文化中大家都熟悉的智者诸葛亮采用了“音译加意译”的方法，便于西方人很好地理解“诸葛亮”的转喻性含义。

（2）音译加注。“音译”无疑是一种直译法，倘若太多这类的按音直译，就会大大影响人们的正常阅读和理解，洋泾浜味道过浓，因此可将汉语基于图式范畴论形成的“属加种差”构词法嫁接过来，形成一种“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例如：

neon 霓虹灯 jeep 吉普车 等等。

（3）以注点题。可先按字面意义翻译之后，再用译入语通俗而又地道的说法加以注明，如将汉语的“睁眼瞎子”译为“to be blind with your eyes open (i.e. illiterate)”；将“一肚子草”译为“his belly full of grass (There is no sense in him.)”

4. 突显

人们在观察和认识外部场景时，都具有聚焦某一事体的能力，如同样面对“湖中有亭”这一场景，既可以“湖”为参照点，从“湖”说起，可表达成“The lake has a pavilion in the middle.”也可以“亭”为参照点，即以“湖”为背景，突显“亭子”，表达成“The pavilion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lake.”此时“湖”与“亭”的“突显图形-消显背景”关系可以互相转换。但有时则不能，如：

The bike is near the building.

而不能说成：

*The building is near the bike.

这是因为突显图形往往是较小的，且具有移动性，而消显背景往往较大，不可移动。

Langacker曾以“半瓶水”为例解释“突显”现象，图6最左图表明一个“客观情景”：一个盛一半水的玻璃杯子，但有人看到的是“半瓶空”，

有人看到的是“半瓶实”等，这都缘于人们突显了不同对象，现以下图解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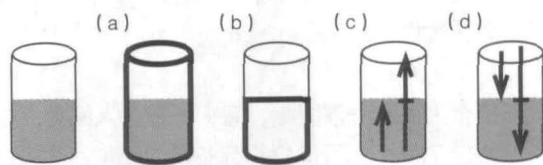


图6

- a. the glass with water in it (突显整个杯子)
- b. the water in the glass (突显杯中的水)
- c. the glass is half-full (突显杯中的水满了一半)
- d. the glass is half-empty (突显杯中仍有一半为空)

这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达到自己思维和表达的目的，满足自己对场景理解的要求，可突显同一客观场景中的不同对象，因而就有了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法。

突显机制对于翻译同样重要，即在英汉互译时，既可遵循相同的表达方法，也可作适当调变，如英汉两语言中都有大量的转喻表达，特别是在对待同一事体或动作时，两民族有不同的突显习惯，但常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

（1）英民族突显过程，而汉民族突显结果，如英语中习惯说“Wet paint”，表述其现行状态或过程，而常译为汉语的“油漆未干”，表述的是结果。

（2）英民族突显结果，而汉民族突显过程，如英语说grade the papers，可指“给试卷打上分数”的结果，而汉语常转喻说成“批改试卷”，突显了动作的过程。

许多学者讨论了如何翻译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字，译法若干，莫衷一是。我们认为，这其中就涉及到CL的转喻性突显问题，不同译者仅只突显了“道”中的部分信息。我们知道，“道”的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高度概括，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一旦说出来，就不是原来那个“道”了。同样，它一旦被翻译出来，就已或多或少地离开了原本之“道”了，真可谓“译可译，非常译”。因为被说出来的那个“道”只能是高度概括“道”这个整体概念中的一部分，依旧可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性突显机制做出合理解释。正如钱钟书先生（1999：409）所说“道之全体大用，非片词只语所能名言。”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钱先生这句话的含义，特引用澳门理工学院的林巍（2011）的译文“The totality of the Dao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is something that can never be named by any single word or phrase.”据此，我们或许可作大胆设想：老子在这里亦已认识到“转喻机制”的奥秘了，奥妙无穷的“道”只可存在于心中，人们难以言说它，更难翻译它。若坚持要说或译，也只能突显出它的一部分含义而已，别无他哉！

5. 结语

认知翻译学,是一门将“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与“翻译学”紧密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对研究翻译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Langacker的识解原理拟将其基本策略定位于“如何在译入语中识解原作者在原作品中的原意图”。

本文将识解5个要素归结为4类,其中尤以“突显”最为关键。有“突显”,就一定有“辖域+背景”,因为前者是相对于后者而产生的;它也涉及到“视角”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就会有不同的突显对象;当然了,“详略度”,说到底也是一个突显问题,“详”是要对值得多关注的内容加以突显,“略”是要对值得省略的对象加以忽视而更多地关注突显信息。

“识解”是认知语言学中一种关键的认知方式,是区别于其他语言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突显”,可用于解释若干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该认知方式也完全适用于认知翻译学,研究翻译过程,解释若干传统的翻译技巧。同时,“识解”所反映的是“人之理解方式”,与翻译过程研究中关注人本精神的基本出发点完全一致。这也说明,只有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视野下,较好掌握体验人本观的基本原则,才能更好地理解认知翻译学。

参考文献:

- [1] Danks, J. G. Shreve, S. Fountain & M. Mcbeath. 1997.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 Halverson, S. 2010.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Method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49-369.
- [3]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I)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Langacker, R.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Vol.II)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Martin, R. 2010.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6] Shreve, G. & E. Angelone. 2010.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7] 胡庚申. 2008.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6): 11-15.
- [8] 蒋晓华 宋志平 孟凡君. 2011. 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新探索——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综述[J]. 中国翻译, (1): 34-36.
- [9] 林巍. 2011. “非常道”与“非常名”——关于不可言说和不可译的翻译[J]. 中国翻译(3): 56-62.
- [10] 刘新桂 王国富. 1994. 英语成语典故大辞典[M] 北京科学出版社.
- [11] 卢卫中. 2011. 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 中国翻译, (2): 64-67.
- [12] 马克思. 197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3] 彭发胜. 2011. 《天下月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J]. 中国翻译, (2): 23-28.
- [14] 钱钟书. 1999. 管锥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 [15] 任文. 2011. 试论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中立性”问题[J]. 中国翻译, (6): 36-41.
- [16] 王宁. 2011. 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J]. 中国翻译, (2): 10-15.
- [17] 王寅. 2005.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 (5): 15-20.
- [18] 王寅. 2006. 解读语言形成的认知过程——七论语言的体验性[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6): 53-59.
- [19] 王寅. 2008.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中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3): 211-217.
- [20] 王寅. 2009. 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J]. 哲学动态, (10): 84-89.
- [21] 王寅a. 2012. 认知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4): 17-23.
- [22] 王寅b. 2012.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体验人本观与认知语言学[J]. 外国语, (6): 18-27.
- [23] 杨柳 衡浏桦. 2011. 《道德经》的诗学特色与翻译[J]. 中国翻译, (6): 17-26.
- [24] 张经浩. 2011. 从《白菜与皇帝》谈起[J]. 中国翻译, (5): 84-85.
- [25] 张其帆. 2011. 汉英同传中删减与增译现象的案例分析[J]. 中国翻译, (6): 42-46.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nd Means of “Construal”

Abstract: Cognitive Translatology(CT) is a newly-bor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which is a result of clos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on the one side, with Translatology on the other, and which fully reflects Embodied Humanism of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The present paper will describe CT as how to construe the authentic intention by the author himself in the original work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will,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gnition, briefly analyze the commonly-used translation methods by means of “construal” (including 5 elements: specificity, scope, background, perspective, salienc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linguistic subjectivity,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specific new approach for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process.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process; construal